

珠江抗日根据地——

三角洲上的红色堡垒

■周一

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广东省南部，内部以平原地形为主，多条河流在此交汇，土壤肥沃，农业发达，盛产水稻、桑蚕、塘鱼等，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从区位优势看，这里南濒大海、北邻广州，香港、澳门分处东西两侧，是连接港澳、通达海外的重要交通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催生了较为发达的手工业、轻工业与国际贸易，地区经济水平和民众受教育程度都相对较高。然而，也正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常被外国侵略者当作发动侵略战争的桥头堡。

1938年10月，侵华日军陈兵珠江口，随后兵分多路，向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宝安、东莞、顺德、南海等地发起进攻。在此驻防的国民党部队奉行消极抗战方针，一边假意发布《告广东同胞书》呼吁保卫广东，一边仓皇撤退，将大部兵力调往粤北，导致这一地区很快沦陷。日军占领后，加紧诱降当地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奸绅，建立伪军武装以维持法西斯统治，疯狂掠夺战争资源。一时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也日益高涨。

白手起家建立游击队

就在日军刚刚占领广州之际，提前潜入此地的共产党员吴勤，在城南组建起一支抗日义勇队。尽管这支队伍仅有五六十人，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但队员们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以隐蔽设伏、突然袭击的战法频繁出击，多次烧毁日军船只、粮秣，很快赢得了附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扩大影响并争取后勤保障，抗日义勇队主动与退守外地的国民党广州市政府取得联系，获得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以下简称广游二支队）的正式番号，以及一些必要的给养和武器。一时间，广游二支队在珠江一带声名大噪，众多群众慕名投身抗日队伍，使其规模迅速发展到数千人。

从地理位置来看，广游二支队战斗的珠江地区三面受敌、一面靠海，几乎是一块“飞地”，敌情威胁极大，支队生存面临严峻挑战。为增强部队战斗力，强化党的领导，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对这支抗日武装给予高度关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省委和八路军办事处陆续派遣多名党员、干部加入广游二支队，并在支队内部建立不公开的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广游二支队迅速开展整编、训练、教育和人员筛查工作，剔除队伍中的投机分子，逐步将其打造成一支听党指挥、以工农成分为主、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



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五桂山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资料照片

1940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要借助广游二支队的合法名义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决定建立南番中顺（即南海、番禺、中山、顺德）中心县委，开辟稳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此前，广游二支队已在番禺以南的大谷围一带建立游击区，但这里人口稀少、土匪伪军横行，并不适合长期坚守。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中心县委决心在顺德西乡建立根据地。这里人口密集、物产丰富，且周边多为水网地带，鱼塘连片、桑林蕉林密布，是天然的“青纱帐”，非常适合屯兵和开展游击作战。同年11月，支队主力挺进西乡，通过打击伪军、严明群众纪律、开展政策宣传等工作，迅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与支持，根据地建设稳步推进。

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

随着力量不断壮大，广游二支队逐渐在西海一带站稳脚跟。他们频繁袭击日伪军、破坏其公路交通线，全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41年9月，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继续拓展根据地的可能性与主要方向。在听取调研人员汇报后，会议认为可向番禺以南的中山一带发展：这里距海更近，能通过香港、澳门争取国际力量支持，且与东江抗日根据地隔海相望，有望成为连接两大根据地的重要战略节点。同时，中山以南横亘着五桂山，山林密布、地形复杂，为开展游击作战提供了天然有利条件。据此，会议确定了“经营番禺”“发展中山”的战略方针。

10月下旬，按照作战部署，广游二

支队一部率先向五桂山挺进，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我军全歼驻守此地的伪军，缴获一批武器、给养。随后，中心县委迅速派出地方工作人员深入五桂山周边，广泛开展“抗匪保家，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严惩当地土匪恶霸，逐步建立起稳固的活动据点。到1942年年中，五桂山一带的日伪军和土匪基本被肃清，当地群众对我党我军高度认同，珠江抗日根据地的范围不断扩大，还建立了与东江抗日根据地联络的海上交通站。

珠江抗日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日军恐慌，他们唆使伪军、海盗袭击我方来往船只，企图切断珠江、东江两个根据地的联系。为此，珠江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海上游击队，打击珠江口的敌军势力，同时保护当地渔民的生产活动。这支游击队成立之初面临重重困难：既无船只也无火炮，游击队员甚至缺乏基本的航海、气象和水文知识，无法与敌人直接对抗。当地渔民得知情况后，纷纷主动加入游击队，将自家渔船改作“战船”，还把手帮帮队员开展海上战斗训练。1943年秋季渔汛时，伪军、海盗企图趁机动抢渔获，海上游击队闻讯出动，成功俘虏多名敌军并缴获船只，极大震慑对手，被表彰为“海鹰队”。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海鹰队”不仅在人员素质、武器装备上有了显著提升，还多次圆满完成两大根据地之间的人员、情报、物资护送任务，受到中心县委和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人在号谱在”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背后的故事

■刘毅 邢瀚鹤

息传递受阻的艰苦环境下，嘹亮号音传递命令、调度队伍、指挥作战，成为红军重要的军事联络载体，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沿用大革命时期的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1931年冬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着手编写我军专属号谱。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在瑞金召开红军号谱会议，根据部队在作战中反馈的意见，制定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发出《关于号谱问题的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各军的指挥员和司号员熟悉掌握统一号谱，以便全军统一的号令行动。换用新号谱后，红军指挥效率显著提升，部队协同作战能力得到加强。而且，红军可通过敌军号谱掌握其战场动向，敌军却对我军号谱一无所知，这为我军掌握战场主动权提供了帮助。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珍藏的这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能安然保存至今，要归功于老红军罗广茂。正是他倾尽全力、以生命守护，才让这件珍贵的红色文物穿越硝烟留存下来。

1930年，年仅15岁的罗广茂在福建省汀县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身形比同龄人瘦小，却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且头脑机灵，十分符合司号员的选拔标准。在担任红4军第3纵队的司号员后，他又被选派为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第一批学员，系统学习人民军队自主制定的号谱与司号制度规范。经过一段时间刻苦训练，罗广茂熟练掌握各类军号的吹奏技巧。

结业时，学校发给每位学员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要求大家充分认识号谱的机密性和重要性，要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这本“声音情报”。带着这本号谱回到红4军后，罗广茂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随后又调至红12军第101团担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他再次调任红5军团第43师师部司号长。尽管工作调动频繁，但罗广茂始终将号谱随身携带，让“人在号谱在”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

司号员是战场上的高危岗位，作战时为了让号声传得更远，司号员必须站在相对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冲锋时刻，司号员和旗手一样，位置极易暴露，常常成为敌人集中射击的目标。1934年，罗广茂在连城作战时中弹受伤，被送往汀县四都镇红军医院治疗。半年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四都镇的红军医院在战火中被冲散，伤病未愈的罗广茂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伤

发展力量扩大根据地

1944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广东省委的战略部署，番禺、顺德、中山等地均抽调部分力量北进，与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北进兵力协同，为扩大游击区做准备。这一部署实施后，珠江地区的抗日武装分散开来，协同指挥的难度随之加大。为解决这一问题，广东省委、广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作出决定，成立珠江纵队和珠江三角洲指挥部，统一领导顺德以南至中山五桂山一带的抗日武装，以更灵活的游击作战打击日伪军，巩固根据地。

1945年1月15日，珠江纵队发表成立宣言，公开番号，并号召“与我们的兄弟部队东纵队、琼崖独立纵队共同坚持华南敌后战场，为解放华南同胞而奋斗”。珠江纵队主要分为3部分：第1支队、第2支队继续在五桂山、番禺以南两个主要根据地坚持战斗，重点打击盘踞在此的伪军和伪政权；独立大队则向西整合南海、三水一带的抗日武装，逐步开辟南三边抗日根据地，为接应我军南下部队做好准备。

在发展力量的同时，各部队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经常利用战前动员、战斗间隙开展形势任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以及“抗战、团结、爱民”宗旨教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以此提高各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让大家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珠江地区远离党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时外援较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部队官兵经常风餐露宿，以甘蔗叶为被、稻草堆为床。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主动给大家讲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战士们深受感动，自觉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还打趣说自己吃的是“革命饭”、生的是“英雄风”。

从广州沦陷到抗战胜利，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从最初的100余人发展到2700余人，逐渐成为华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他们虽孤悬敌后，却凭借不懈奋斗和不畏牺牲精神，锻造了坚固的战斗堡垒，成长为珠江三角洲上的抗战脊梁。到抗战胜利前夕，珠江抗日根据地已在顺德、番禺、中山、南海等8个县的部分区域，建立起拥有40万人口、近10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开辟出3000余平方公里的抗日游击区。同时，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先后派兵前出湘粤赣桂边、粤中、西江、粤北等地，为策应、支持其他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作出重要贡献。

链接历史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行动，于四川省北部强渡嘉陵江，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此次渡江，拉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序幕。截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共歼敌12个多团1万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具有重大意义。

4月下旬，国民党军为防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重新调兵遣将，加快实施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从苍溪、南部尾随红四方面军西来的川军刘湘主力王缵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彭明、两河口、重华堰进攻；邓锡侯和孙震两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胡宗南部则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企图配合敌左、右两纵队实施南北夹击。此外，退缩到广元以北的邓锡侯另一部，由广元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的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防止红四方面军东返；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坝、店子堰一线，阻止红军南出。国民党军从几面逼来，红四方面军处境十分被动。

此时，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惊人毅力和快速的行动，已推进到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南岸。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计划首先突破邓锡侯部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打开西进的通道，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番、汶川。

北川河谷是红四方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敌军察觉红军有西移的动向后，邓锡侯急令陶凯率3个旅到土门、北川河谷布防。北川河谷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山峰陡峭，东西蜿蜒百余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地形十分险要。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

为打破敌军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第一步，向南出击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吸引和调动川军主力。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

4月底，在敌军调兵设防的同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88师于漩坪歼敌一部，一举攻占伏泉山。5月1日，第30军第89师占领墩上。2日，第9军、第30军主力从蔡家嘴、乱石窝抢渡蒲江，并于3日攻占大堰口。

敌军为恢复对北川河谷的控制，在邓锡侯统一部署下，由第29军第2纵队司令王铭章指挥3个旅9个团，从擂鼓坪向北川河西岸攻击；由第28军第1师师长陈鼎勋指挥5个旅14个团，从茶坪向北川、墩上之线攻击，企图恢复原有态势，守住北川河谷。

6日，敌军由茶坪向北进犯，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30军各一部在大堰口的白家林予敌重创。8日，敌军被迫退回茶坪防守。这时，红四方面军第4军一部进至千佛山以东地区。10日，第30军第88师和第9军第25师各一部从千佛山东侧向西左右夹击，攻占千佛山主峰佛祖庙，并追歼逃敌至西大堰口。至12日，敌我双方在大堰口、白家林、千佛山等阵地反复争夺，战斗十分

激烈。广大红军战士不畏枪林弹雨，冲锋勇猛、固守如山，使敌军始终未能夺回伏泉山、千佛山等要地。13日，红31军一部攻占桃坪，红军向南进攻的目的达成，随即开始对土门发起总攻。5月14日拂晓，红四方面军以第9军、第30军和第31军一部，分左、中、右3路向土门发起总攻。敌第28军以7个团1个营及地方屯殖军在土门一带筑碉设防，企图阻止红军去路。经激战，敌军土门防线土崩瓦解，红军于当日占领土门、干沟，并乘胜追击，于次日占领茂县。

得知红军突破土门封锁线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于当晚电令刘湘，命其组织川军反攻伏泉山、千佛山红军阵地，进到漩坪、土门之线，重新封锁土门，阻止红四方面军向岷江流域西进。

5月18日，敌以近3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发起进攻。红军与敌军在大堰口展开激烈战斗，重创敌军1个旅，挫败了敌军妄图重整旗鼓的计划。22日，蒋介石判断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西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下令停止向北川、土门的攻击，改取守势，筑碉固守。随后，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31军各一部和第33军，在副总指挥王树声的指挥下，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在完成掩护和牵制任务后，于6月中旬由东至西先后撤出阵地，7月14日全部撤离完毕。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的一次重要战役。从4月底到5月22日，敌军在该地区先后投入兵力约20个旅，被红四方面军歼灭1万余人。此次战役，为保障方面军西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打开红军挺进川西的通道

胡遵远 胡道俊

位于四川省茂县土门镇的三元桥（下图），是1935年红四方面军土门战役的历史见证。红军在此突破国民党军“土门封锁线”后，在桥身篆刻29条红色标语（左图）。如今，三元桥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基地。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资料照片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封面及内页。
资料照片

在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件中央红军使用过的珍贵革命文物——《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本号谱采用毛边纸油墨印制而成，长21.8厘米、宽13.5厘米，是横式小32开本。尽管它不足40页，却是目前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经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号谱。

号谱内页采用五线谱形式，收录了340余首曲谱，内容涵盖红军生活、训练、作战指令，以及部队番号、职务、首长代号等信息。从音乐特征来看，它采用五声调式，有着鲜明的革命军队音乐风格；节奏以“三连音”为主，铿锵有力，尽显红军的勇敢坚定；节拍融合1/4拍与2/4拍，灵动活泼；旋律上频繁运用同音反复和乐节性重复，既强化了音乐的气势，也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90余年前，这本号谱成为红军特殊的“战地密码本”。在通信手段匮乏、信